

## 研究論文

#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 在社會研究的運用\*

游美惠\*\*

---

### 摘要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這類的研究方法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視，然而現今台灣的社會研究，對於這方面的討論與實際運用，明顯不足；但本文也並不打算全面地解說在社會研究中進行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的方法與步驟，筆者寫作本文的用意，其實是於欲強調現今的社會研究，在今日多元方法交叉檢證（triangulation）的研究策略已漸受重視之際，除了主流的社會調查方法以及質化取向的訪談或民族誌田野工作之外，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其實都應納入基礎訓練之中，以便使研究者能善用研究工具與不同的方法取徑，並對蒐集得來的資料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與分析，以臻研究之精進。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都是針對社會製成品作解析的研究取向，但是其功能與解析觀點不盡相同，在研究實務上的運用上也有各自的長處與限制。由於內容分析法較屬於實證主義傾向，強調科學客觀的量化分析，因此本文先就幾個具體的研究實例談起，討論內容分析法雖可提供系統化的資料作為討論基礎，但研究者卻往往容易

---

\* 本文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調查研究」主編章英華教授的寶貴意見。文中觀點及缺失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著重在文本的靜態面向而忽略要回到資料本身的現象脈絡去關照，另外，文本要素之間的結構關聯性與互動意涵也常被忽略。因此，若欲做到「爬出文本外」或是掌握其「未書寫出來的部分」，那麼強調意義詮釋與解析的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方法則是較為有利的工具。

文本分析通常只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如新聞報導、文學作品、電影或海報圖片，作解析和意義詮釋，但晚近學者也很強調社會研究之中的「互為正文的分析」或「語境分析」。至於論述分析，則包含更為廣闊，不只是單純僅檢視文本本身，而是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及其相關社會場址 (institutional sites) 和歷史文化因素都納入分析之中，所以論述分析絕對不是一種任意的拆解，其物質性的基礎與實質效應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容忽視。

不管是採用內容分析或文本及論述分析也好，只要是針對文件資料或任何其他社會製成品所作的分析，都應該配合呈現實例，並具體而詳盡地描述出分析的素材以為佐證，增加其研究的說服力。

本文最後在結語部分則回歸探討方法論的相關議題。

關鍵詞：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論述分析

## Content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Mei-Hui Yo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content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author does not intend to introduce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of these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By contrast, the author compares as well as reviews each approach in order to reconsider 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social researches. Each approach h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However, the author put more emphasis on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at is because the relevant issues

regarding discourse analysis are seldom explicated in the exited literature.

**Key Word:** content analysis, textual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

## 一、緒 論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sup>1</sup>分析這類的研究方法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視，然而現今台灣的社會研究<sup>2</sup>，對於這方面的討論與實際運用，明顯不足；但本文也並不打算全面地解說在社會研究中進行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的方法與步驟，筆者寫作本文的用意，其實是於欲強調現今的社會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除了主流的社會調查方法以及質化取向的訪談或民族誌田野工作之外，可以更積極地多採用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的方法，來幫助加深對現象的分析深度。

將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三者加以比較，內容分析似乎較為一般的社會研究者所熟知，尤其在新聞與傳播研究上被廣為運

---

1 論述是指在特定的社會情況和歷史條件下所生產出的一套相關的陳述，它們可以界定知識的專業領域，如心理治療、藝術評論等，從 Foucauldian 的觀點，理念 (ideas) 的形成與運作絕不會和權力的制度與關係脫離關係 (Chaplin 1994: 87)。而若欲更進一步了解此一概念，則可參見 M. Foucault 的系列相關著作。

2 本文所指的社會研究，是較廣泛的指稱，並不限於某單一特定學科 (i.e. 社會學) 所作的研究，只要是該研究所探討的議題是與社會文化現象有所關聯，便是本文所指稱的社會研究；所以本文引用或評析的文獻包含狹義的社會學研究、新聞傳播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教育研究等。

用<sup>3</sup>，而教育研究也常應用此法來對教科書的內容加以檢視分析，然而此種被認為是唯一能夠顯示大規模的、整體的媒體表現的研究方法卻也有其所面臨的難題與待克服的盲點，所以本文打算先對內容分析法作初步的討論，而後據之申論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所能提供的不同取向以及此二法可以被社會研究者更廣為採用的理由。內容分析、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這三種研究方法均是針對社會的製成品（social artifacts）作解析，但是其功能與解析觀點不盡相同，在研究實務上的運用上也有各自的長處與限制，本文主要將針對此作一評析。最後則論及社會研究的批判實踐性格也能透過論述分析的研究取向加以具現，同時本文在結語時也將回歸思索研究方法的相容性與適用性等相關問題。

## 二、內容分析法：內涵及其批判

美國社會學家同時也是相當受歡迎的社會研究法教科書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的作者 E. Babbie (1995) 將內容分析法與其他對既存統計資料的分析和歷史比較方法同列為一類，名為「非干擾性的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並指出內容分析法是研究者檢視某一類社會（製）成品 (social artifacts)，主要是對各種不同的溝通形式，例如書籍、雜誌、詩集、報紙、歌曲、畫作、演講、信

---

3 以國內相關的新聞傳播研究所之碩士論文為例，據王石番 (1992 [1989]) 的整理分析，採用內容分析方法的比例頗高：政大新聞研究所三十六年來 323 位畢業生中，碩士論文與內容分析有關者約八十三篇，佔四分之一強。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以內容分析完成者均佔三分之一強。而政治作戰學校的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中，內容分析有二十篇，更佔了二分之一強。(Pp. 75-76)

函、法條等加以分析 (Pp. 306-7)<sup>4</sup>；Barelson (1952) 對內容分析的綜合討論則更常被引用：「內容分析是針對傳播的明顯內容，做客觀、系統、定量的描述」(p. 18)。其中的客觀性指的是在研究過程中，每一個步驟的進行都必須基於釐訂明確的規則和秩序；系統性是內容或類目的採用和捨棄，必須符合始終一致的法則；定量性則是分析內容可按規則對擬訂之類目和分析單位加以計量，用數字比較符號文字出現的次數，以達到準確的要求<sup>5</sup>。Manning & Cullum-Swan (1994) 在簡介內容分析法時，也將此法定義為是一種量化的研究技術，是想要透過標準化的計量單位與測量，將文件之中的特質彰顯出來或作比較 (p. 464)。

然而，如此號稱「科學又客觀」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研究者運用後，卻因為種種不同的因素而引起了不少的批評：首先，到底內容是什麼，範圍非常含糊；也就是說，內容分析的對象是什麼不夠明確。於是，誠如王石番 (1992 [1989]: 5-6) 所言，有些研究者便會誤以為，內容分析似乎只在計算某種特質如數一數文字、顏色和特徵等。大力主張質化內容分析的 Kracauer 便曾反駁 Berelson 的看法：他認為 Berelson 的量化策略，在決定媒體的內容和意義上，根本不是那麼具有客觀性和可信度。量化分析的解釋力不足，多半受到研究方法問題的限制。也就是說，當分析者企圖由先拆解文本，將文本視為可供測量的單位 (字眼、表現、陳述等)，從而建立文本的意義時，事實

---

4 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各種不同的材料，Reinharz (1992: 146-147) 也詳細地列舉出不同的研究文獻，包括對童話故事、小說、藝術品、流行時尚及各式各樣的手冊等所作的內容分析。

5 更詳細的相關於 Barelson (1952)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王石番 (1992 [1989]: 4-5)。

上便已經搗毀他們所要研究的客體 (Jensen & Jankowski 原著, 唐維敏譯, 1996: 176)。

定量的內容分析可以協助研究者從資料中界定主要的概念, 對大量既存的經驗資料加以提綱挈領, 濃縮要點, 常能得到運用問卷調查或是訪談等方法蒐集資料之實徵研究所不容易得到的結論; 然而, 要留意的是: 採用內容分析法, 基本上需要對概念加以量化, 但是是否每一個概念都可以量化而又如何加以量化, 則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研究者若不嚴肅看待或謹慎處理, 可能會威脅到該研究存在的價值, 成為該研究致命的傷害。因應之道可以是在研究之中, 對於相關概念的概念化與運作化作清楚仔細的交待, 包括其中考量的重點與分類量化的基礎, 幫助說明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也可增進研究整體的價值。

在這方面可以借鏡的一些西方研究, 例如 Mann and Grimes (1997) 針對美國家庭社會學教科書之相關內容分析研究, 其中對其研究設計與概念都作了頗清楚的交代; 而 Durrheim & Mokeki (1997) 針對南非的心理學期刊所做的內容分析研究, 在其內文之中也曾特別詳細交代理論概念上的區分如何在其研究之中, 用何種方法, 被轉換成為經驗性的分類 (empirical categories), 以便研究在後續階段作量化的分析處理; 因為該研究是特別針對種族議題在作探討, 作者們在初步分析的階段需要將所有的相關期刊論文分成兩類: 一類論文是僅將種族視為是描述性的科學性的分類 (descriptive scientific category), 另一類論文則是將種族問題化 (problematise) 成為一個政治性的議題, 文中作者詳細交代分類的依據 (p. 208), 並清楚地說明樣本來源及編碼者的安排考量因素等 (p. 209), 研究本身並沒有使用任何高深的統計技術, 但其量化資料的呈現及相對應的分析討論卻頗有助於我們對該現象的了解。而 Reinharz (1992) 在其探討社會研究中

之女性主義方法的專書之中，介紹內容分析法並引介一些研究範例之時，也會提及該內容分析研究之編碼系統是如何建立的，而又如何在研究過程之中運作 (p. 151)，所以，這可以說是任何一個內容分析研究不能忽視的核心。

但是有些研究者運用內容分析法所進行的經驗研究，卻常眼高手低，在概念化與運作化的功夫上顯得草率；舉傳播學的一項研究為例，在「我國社會變遷時期特殊政論雜誌的內容分析」一文中，作者對民國七十四年一月三日到十一月二日出版的特殊政論雜誌的內容特性加以分析(王石番(1992 [1989]))；首先他並未解釋為何民國七十四年可以特別稱為我國社會變遷時期以及其研究對象「深根」、「前進」、「新路線」、「八十年代」、「雷聲」等七個系列為何稱為「特殊政論雜誌」，這顯然就違背了內容分析必須為非選擇性 (non-selective) 的要求。而且在這個對政論雜誌的內容分析的研究中，內容分析最重要的分析類目的劃分方面，研究者也僅以空泛的字詞來定義其類目，例如「標題是否具聳動性？」的這一項分析類目，研究者將之定義為「指該篇文章標題或題目的製作方式是否以誇大、聳人聽聞之方式來處理」(p. 328)，筆者以為，這樣的解釋根本是在套套邏輯 (tautology)，無法說明其分析的「客觀性」及「系統性」的基礎何在？而同時研究者也未提供任何的例示來輔佐說明，如此的分類標準與歸類的結果也就不免顯得相當武斷，不同的登碼者 (coder) 或分析者的判斷標準與歸類結果不見得會相同，如何取信於人？但此研究的分析成果就以如下的方式呈現：

就標題是否具聳動性來說，用卡方統計法檢定發現，政論雜誌系列別和標題是否具聳動性有關 ( $\chi^2 = 36.45$ ,  $df = 6$ ,  $p < 0.001$ )

亦即標題是否具聳動性因系列別而有不同；「民主天地」、「東北風」系列標題具聳動性達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深根」系列不具聳動性的標題近百分之七十。（王石番，1992 [1989]: 344）

這其中的具體意含 (implications) 到底是什麼，著實令人費思量，作者並未呈現出具體例證以告訴讀者「民主天地」和「東北風」的聳動性的標題是什麼 (what)，也未在研究中解釋這種聳動性的標題為何 (why) 以及如何 (how) 被製造出來，對社會科學研究者說來這毋寧是更重要的問題。如此的研究結果，其標題訂為「全部文章的定質分析」，很難教人信服，讀者也無從掌握其意義。這反應了一個問題，便是：研究的方法論理論與研究實務脫節，研究者在專書之中對方法的討論與操作技術講述地頭頭是道，但在作實際的研究時卻又仿若那些要求是不相干的理論性文字；且在統計分析的步驟之後應作的解釋也付之闕如，以致讀者無法自其研究之中對當時的政論雜誌有更深入的了解。

另一個較近期的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對國民小學社會科第五冊的教師用書作「人際關係」單元的探討，在研究方法部分，作者交代其內容分析的類目與單位，其中的單位部分，作者指出「內容分析法的分析單位計有：意義、字、語幹、段落、頁、課、時間、及空間等單位。本研究依據所分析的內容不同，採用不同的分析單位」（秦葆琦，1999: 359），隨後便分別舉例，說明在何時將採不同的單位來進行分析。其中不管是以意義或是以句子為單位作分析，都讓人不禁要質疑，這中間的「客觀性」何在？是否會因人因時因地而決定採用不同的單位界定？作者為避免如此的缺點，便約請兩位國小教師擔任評分員，連同研究者三人，進行相互同意度的檢定，這是內容分析研究者不能

隨意減省的必要工作。筆者試圖回顧西方近年來的一些內容分析的研究，發現到不管是針對電視錄影帶之內容或是教科書等書面文字資料，研究者在論文的寫作均不忘會明確交代編碼人員的組成性質，及其訓練與操作過程 (Durant and Rome, 1997; Taylor and Stern, 1997; Ford and Kramer Voli. et al., 1998)，這是內容分析報告寫作必得涵蓋的重要部份，不能任意（或說刻意）加以省略不談。

事實上；一個負責任的研究者是有必要將其研究的過程與信效度的評估均交待清楚。Taylor and Stern (1997) 在他們針對電視廣告中的亞裔美人刻板印象所作的研究報告中便曾針對編碼與變項的操作均做了完整的說明，甚至是在研究的發現部份，也首先交代信度的測量結果，並且將其分析的問題及研究結果一一呈現，而後才作綜合討論：該研究發現雖然在出現的份量（頻率）上，亞裔美人是被過度再現的 (over-represented) 但是其中仍有刻板化與代罪羔羊表徵呈現及性別權力不對等之訊息在被傳遞與刻劃，因此數字的記錄與呈現雖是研究的基礎，卻不能視之為分析的充分條件，訊息的內涵本身不僅不能被棄置於一旁，更需要去探索與深究。再者，採用內容分析法的研究者也應該要認識到：即使在其研究之中，已經就信度效度問題作好處理，可以自圓其說，但是這種客觀的科學研究，「應該只是反映在既定時間對既定的問題依既定的方法所做的可能的最精確的量度」(Wallerstein, 1974, 引自瞿海源, 1982; 246)，所以要能舉出實（例）證，配合上下文脈絡與社會情境作合理解釋，便更顯得必要。

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量化之後意義何在也是研究者應該仔細思考的。並不是每件事物量化之後都會有意義存在，例如，若是試圖從一個心理病患回答問題的答案推論他的心理疾病時，絕對不能只將答案拆成單字，再予以分析，如此是不切實際且了無意義的。又如，

在對色情海報作解析的研究之中(游美惠,1991),與其對其中的人物、字詞或其他要素加以量化並作描述性的統計分析,倒不如多花工夫作有意義的詮釋與解構批判。因此內容分析的研究設計必須特別要求其要適合資料來源的情境。但是由於內容分析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分類與統計來分析,所以研究者所希望探討的是可以統計的類目:唯一的條件是這些類目必須是可辨認的,而且其出現的頻率須足夠使統計分析有效(Fiske 原著,張錦華等譯,1995: 180),這是量化取向內容分析法具有的特色,但是也很容易讓研究者忽略了兼顧情境,作出合理且具說服力解釋的重要性(Manning & Cullum-Swan, 1994: 464);所以Fiske (1990) 便曾針對 Barr (1975) 對一九七四年的世界盃足球賽的電視轉播所作的內容分析研究指出:大多數的內容分析所共有的問題是,這種分析法並不回答「那又如何」的問題。兩個電視台球賽球賽轉播方式的比較,所得的差異是否顯著?如果是,造成差異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它們有不同的觀眾嗎?……(張錦華等譯,1995: 188) 據此而論,內容分析對這種推理的問題似乎不容易處理得妥切,但若憑心而論,至少其能提供我們一些資料作為我們討論的基礎。

另外一個較近期的運用內容分析法的小型研究,白亦方和吳嘉惠(1997) 對美國的小學社會科課本作政治社會化的分析,宣稱是在作定質性的內容分析,不刻意作定量的分析。但在行文之中,出現了諸如「圖文之間在在顯現了國旗高度的神聖性與榮耀性」(p. 17) 的文字,卻未見研究者在文中對那些課本中的圖文有任何的著墨,僅僅交代相關的圖片見文末之附錄,言下之意似乎認為:任何人見到圖片都會有相同的反應與詮釋,這樣的預設其實是很有問題的,好像內容本來就很客觀地存在資料裡,文字圖片均為中性的傳遞媒介而已,殊不知文本與內容是多義與開放的,訊息的內容不會只有一個意義以待挖掘,

「文本中的意識形態是不可能被讀盡（“read off”）的，因為意義是在對文本的詮釋的過程之中產生的，並且文本是開放而允許有多種詮釋的」（Fairclough, 1995: 71），作者應該舉證說明國旗的神聖性與榮耀性是被如何的展現，藉由何種人、事、物和何種過程來烘托，以致能推論出其中的顯見性。

就內容分析的研究而言，統計指標的本身，應該要回歸到現象脈絡本身，絕對不能成爲一不言自明的自足結論。況且，文本要素之間的序列關聯性也是應該要留意的，亦即，文本當中的陳述、宣稱、觀察或傳遞的訊息，都僅僅只是其中的「要素」（“component parts”）罷了，他們組合在一起也無法構成文本的總合（Iser, 1980: 52），以此觀之，其中的互動意涵才更應該是要去處理的。此外，正如 Reinhartz（1992）所言，要同時檢驗其所言、未說及可能被說的部分，只看外顯的言語資料，是不足夠的！可惜內容分析法在一般經驗研究之被運用，研究者似乎都太著重在文本圖文內容的靜態面向，其中的結構關聯性與互動因此而易被忽視，至於要做到「爬出文本之外」（to “climb aboard” the text），掌握其「未書寫出來的部分」（“unwritten” part of a text），則只有仰賴其他取徑之相互配合了；筆者將在下文討論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時，再就此點作更深入探討。

總之，在使用此種號稱有經驗實證基礎的研究方法時，研究者應該要特別留意研究的設計與操作的問題，一個嚴謹的內容分析研究，除了如前所述，應該兼顧情境因素作細緻的分析之外，一個適度建構的樣本或是適切掌握分析的訊息系統，以及在適當的分析行文當中，以文本的文字內容來呈現佐證，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前述 Fiske 所言，內容分析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系統化的資料作爲討論的基礎，而後續更深入的探討則可以配合運用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等方法，同時也

將更深更廣的社會文化因素納入分析之中，相信將更能掌握分析的深度並且增加研究的說服力。

### 三、文本分析、論述分析與社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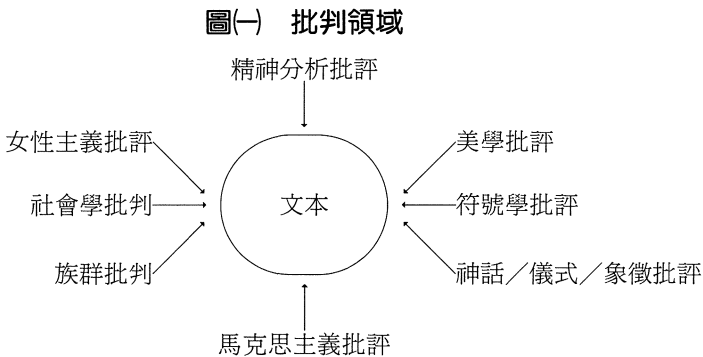
Thompson (1999) 曾針對量化與質化取向的內容分析之異同作過探討並指出：量化與質化的內容分析都是欲針對一批（群）文本依指定的規則以系統化的步驟來加以分析，但是不同點在於：質化的內容分析法較有彈性，因為事先決定好的分類範疇在資料的搜集與分析過程之中，仍然是可以再作修正與變動的，因此便不會有迫使敘事資料也得被化約成數字資料的限制產生。但是不管是量的或質化的內容分析取徑，二者均是針對訊息的明顯內容加以描述分析，不去處理潛隱的內容，這其實是內容分析的一大限制。Taylor & Stern (1997) 的內容分析研究也不忘在研究最終表述自身研究的這項限制，並鼓勵未來研究應配合其他研究取徑來加深潛藏意義的探索。關於此點，筆者以為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可以彌補定量的內容分析在此方面的不足，在前一節的論證中提及到量化取向的內容分析法對於相關的社會文化因素之解析，探索深度稍嫌不足（如前述 Fiske 所舉的足球電視轉播的研究例子，見張錦華等譯，1995: 187-8），Kracauer 曾發豪語謂：量化研究充其量只能當作進行質化分析所採用的補充資料！（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6: 176）。有趣的是，此種說法可與實證主義的相反立場加以比較，量化取向的研究陣營宣稱質性研究最好是用於探索性質的研究或是用在研究的初步階段以幫助研究問題或假設的形成。所以，Kracauer 這樣的論斷雖然有立場偏頗之嫌，反應出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極端立場，但若是撇開意識型態的因素，則二

者可以互補是很難否認的事實，本文的書寫則定位為是欲探討文本和論述分析可以提供的長處，以彌補量化分析取向在某方面的不足。

### 1、文本：分析與詮釋

文學理論家刻意地將對文本的分析與詮釋作一區分：就本質而言，文本分析是將一文學作品拆解，觀察其部份之間是如何拼湊相合在一起 (seeing how the parts fit together)，而詮釋則是將與某 (些) 知識傳統相連的價值，如心理分析思想、符號學理論、馬克思思想、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或女性主義思想等，應用到文本之中。圖 (一) 可以幫助說明此點，亦即各種不同的理論思想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文本有不同的詮釋，提出不同的解讀結果 (Berger, 1995: 18-19)。然而，在本文之中，筆者所指的文本分析其實是較接近於後者，也就是文本詮釋，只是仍沿用習慣語，用「文本分析」來指涉此一解讀詮釋的過程 (策略)。

Larsen 在「媒體戲劇內容的文本分析」一文中，直接以文本分析來指稱質化的內容分析，他引述 Kracauer 的論點，文本的內容必須被



視爲「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因此分析就像其他解讀行爲一樣，必然涉及詮釋的動作（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6: 175-176）。Larsen 更進而指出：

柯拉考爾 (Kracauer) 和其他早期質化內容分析者一樣，並沒有提出任何系統化的方法學或分析取徑。他對電影、流行小說、及其他文化類型的文本研究，多半依循傳統文學作品經典研究中的步驟，闡述對媒體的詮釋和「解讀」（並不是「緊密」閱讀）。和專注於少數「大師級」文學研究比較之下，現代媒體文本的問題在於多量、異質性又高。然而，在五〇及六〇年代這段期間，發展出許多完備的分析工具，特別是符號學研究大為精進，已經逐漸開始處理這些問題。（Larsen 原著，唐維敏譯，1996: 178）。

Fiske 也指出：

……最新的符號學理論和結構語言學理論告訴我們，意義總是一直在製造和再製造之中，通常總不會是已完成的事實。發現什麼樣的意義被產製出來、什麼樣的意義是文本和受社會情境所制約的讀者優先期待的，永遠是有趣且重要的工作；於是，傳播所研究的，是在社會中流轉的意義。文本分析是其核心。（張錦華等譯，1995: 213）。

但是，沒能提出任何系統化的方法學或分析取徑，無可諱言地是文本分析無法取信於眾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大原因。對電影、流行小說、及其他文化類型的文本研究，若只是依循傳統文學作品經典研究中的步驟，闡述對媒體的詮釋和解讀，則不免也有自說自話之嫌。就如量化的內容分析會將數字與分類的範疇強加到可觀察可閱讀的文本之

上，文本分析也會因其意識型態批評取徑而被貶抑為是主觀的一面之詞，沒有根據。此外，傳統文學研究所作的文本分析，是將文本視為自足的體系 (self-contained systems)，但是文化研究者與女性主義者則會在被標示特定的意識型態歷史背景之中檢視文本的定位 (Denzin & Lincoln, 1994: 3)，所以，即使媒體文本相當複雜、難以發揮決定力量，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媒體文本終究是某種歷史決定的產物，可以反映出某個時代中的意識形態趨勢(或時代精神) (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6: 177)，這句話其實也正好點出了文本之中的語言及意識形態間的關連性。當我們提及文本的社會性，其實便也是留意到在文本之中，意識型態的生產、流動及其效應，其中所牽涉到的社會(權力關係)意涵，Fairclough (1995: 70) 認為，如何在分析之中將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係表示出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方法論議題，這在以下有關論述分析的討論將作更詳細的說明。

隨著其他輔佐性的理論利器的精進，文本分析愈來愈受社會研究的重視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已有學者專門為文討論此法在社會研究中的重要性了！Fairclough (1995) 列舉出四大理由來申述文本分析應被社會科學界更廣泛認定其價值且加以運用，(一)、理論上的理由：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一向為社會學家所關心探討的焦點，而文本其實是構成社會行動的重要形式，社會學家一向較關心鉅觀層次的分析，但其實他們在分析之時也常須倚賴於各式各樣的文本<sup>6</sup>，只是多半不願意承認罷了！(二)、方法論上的理由：文本是提供證據的一大來源，文本分析能將研究的宣稱紮根於文本的詳盡特質

---

6 依筆者的詮釋，此處所謂的「文本」，應該可以包含像是既有的理論文獻或其他的敘說資料等。

中。(三)、歷史的理由：文本是可以很敏銳地感應到社會的變動過程和多樣性，所以文本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社會變遷指標。四、政治的理由：這是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批判性的目標，愈來愈多的文本（不只是媒體文本而已）有社會控制與支配運作其中，文本分析，作為批判論述分析的一部份，可以成爲一種政治資源，幫助（大家）擁有批判語言的覺曉能力（Pp. 208-9）。

## 2、互爲正文性(intertextuality)與語境分析 [(con)textual analysis]

在此特別要強調的是，此處所指的文本分析並非是作文學性的文本結構分析，可以想見如此的取向較無法滿足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研究興趣；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在意的是文本的社會意涵。所以 Fairclough 便將文本分析更細緻地分爲語言學的分析 (linguistic analysis) 與互爲正文的分析 (intertextual analysis)，二者可互補，相輔相成；除了就文本內部的語言符號作解析之外，更須去注意文本之間的內在指涉關係，也就是說，應將文本當作是不斷進行各種多重變文化意識型態互動的場域，所謂互爲正文的分析便是欲掌握社會的因素及其與文本的互動，或者說欲連結社會結構與文本結構；更具體的說，因爲社會條件會架構文本的消費，甚至將文本詮釋限制於某些特定的歷史定位 (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8)，所以，這種互文關係的檢視與暴露，更是必要。不過欲說明此點仍須先借用文學陣營中一位重要的女性（主義）思想家 J. Kristeva 的論點。

符表的實踐有重新組合語言的能力，「正文」<sup>7</sup> 即是符表不斷地

---

7 此處所指的「正文」，即爲 text，是本文其他地方提及的「文本」。

產生、活動及再重組的場所。在這空間之內，解構了日常溝通的語言及作為再現或表現的語言，這種分解與重組的途徑之一，即是透過排列或轉換與其有關的「正文」或「正文」片段而成，所有的「正文」都是其他「正文」的「正文」，克麗絲特娃借用巴克定(M. M. Bakhtin)的說法將這種關聯性稱之為「互為正文性」。因為「正文」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在「正文」之前及其周圍有其他「正文」，並且在不同層次，以不同形式，或多或少或明或顯地呈現出來。……從認識論的層次來看，「互為正文性」的概念擴大了「正文」的範疇，使「正文」跳出本身的侷限，涵蓋了社會層面。(于治中，1991: 215-216)

而若認清到「互為正文性」此一概念，便不難理解為何文本分析在社會研究中可以被更廣泛地運用。Berger (1995) 曾對「互為正文性」這個概念說明如下：

這個概念一般是指所有的文本，在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會彼此關連，因為我們共有一些文化傳承。……巴克定 (M. M. Bakhtin) 認為互為正文性是根源於人們在溝通時的對談邏輯的方式 (dialogical way)，在會話/對談時，我們會講些什麼話，其實是仰賴於他人所已經談及的、正在說的以及我們預期他們即将要講的內容 (Pp. 91-2)。

Said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 一書中直陳東方主義是一個文化事實，也是政治事實時，也提及了文本性 (textuality) 這個概念，他認為大部份的人文傳統的學者一定都很高興並可以接受如下的想法：文本是存於情境脈絡中的，有如此的一個「互為正文性」的概念存在

(1978: 13)。Morley 也曾引述多家論證來強調「文本不能被孤立看待，文本自有其生產與消費的歷史條件。所以說，我們必須明白，文本的意義必須放置在特定的環境考察，然後想一想，它接觸了哪些其他論述，並再評量，這個接觸又會如何重新結構該文本的意義，以及那些論述的意義」(Morley 原著，馮建三譯，1995: 94)。Bennett 也提過，藉著對閱讀形構 (reading formation) 的探討，可以組成和激發閱讀實踐的一組論述和互為文本的決定因素，可以去連結文本和讀者間的特殊關係；Bennett 在同一篇文章的稍後，更是毫不諱言地承認自己將文本化約為情境 (context)，並提議用另一種方式去重新思考情境，即不管文本或情境，都不能被當作可和對方分離的另一個實體 (entities) (Bennett 原著，胡湘玲譯，1992: 172-3)。其他還有多位學者也提及類似的看法，主張應將訊息文本的論述形構揭露出來 (Thompson 1990; Fairclough 1995, etc.)，才能完成更精緻的語境分析 [(con)textual analyses] (Valdivia, 1995: 123-5)。

舉例來說，林芳玫針對強暴案的新聞作文本分析的研究便曾指出：「成為消息的來源並不必然意謂著掌握公共論域的論述方式與內容」(1996: 74)，因此，即使「強暴」一詞出現的次數多，也並不能表示該報導或該媒體的內容便透露出何種特定的立場，當然也不表示受害人所提出的指控受到承認。所以在如此的研究之中，更應留意的倒應該是強暴一詞出現的上下文脈絡所透露出的訊息：「強暴一詞出現的上下文脈絡也顯現出輿論對強暴指控常持懷疑態度」(p. 97)，所以，語境分析之必要，便是由於其可避免犯了斷章取義的缺點，而又能更深入掌握文本的內外因素，包括上下文脈絡與社會情境脈絡，適切詮釋文本的社會意涵。換句話說，對文本的分析不能僅著重於及字面行文或圖像本身，該文本被放置於何種 (時空) 情境脈絡以及為什

麼，而以上的種種又產生了什麼社會效應？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在同一個研究之中，林芳玫（1996）也分析報紙強暴新聞報導所呈現的語言結構，並以意識型態與權力方面的相關理論加以詮釋，她特別著眼於「動詞的傳動性與非傳動性」和「主動或被動形式的表達」，進一步據此來解析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所以在同一個研究之中，作者同時運用了語言學的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與互為正文的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互補運用的結果，讓研究的可讀性更為增高。據前述 Fairclough 的看法，這便是細緻的文本分析研究，但是林芳玫在其研究之中顯然是認為分析報紙新聞報導所呈現的語言結構，並以意識型態與權力方面的相關理論加以詮釋其實就是在做論述分析。總結來看，林芳玫文中說明同時並用論述分析與文本分析之取向，並未具體明白行文交代其運用這兩個分析取向之原則與操作程序，似乎只能留給讀者自行去體會論述分析與文本分析其中之同與異，是為其美中不足之處。本文在稍後會更進一步說明論述分析，且在本文的結語之中，會試圖針對此二者之緊密關聯作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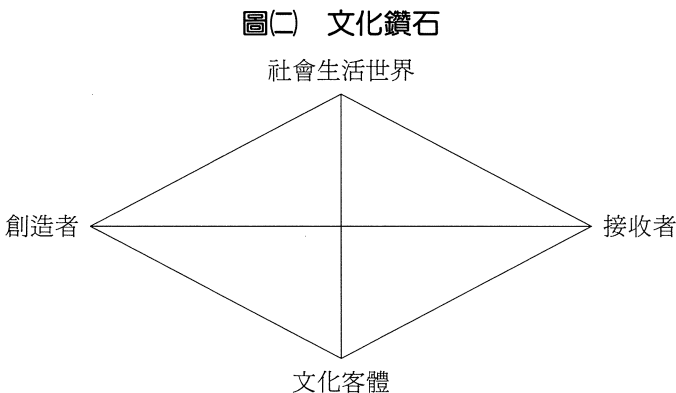
在電影與文化的研究領域之中，語境分析與文本分析並列為兩大研究取向，其中的語境分析便是著重在文化、政治、制度或機構以及工業方面對電影的影響，也就是關心這其中的文化生產過程（Turner 原著，林文淇譯，1997: 160-161）。所以，社會研究在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時，應該同時掌握其脈絡並且細緻地納入分析之中。Reinharz (1992)<sup>8</sup> 也明白表示「現存的文本與遺漏不存在的文本，同時都應該

---

8 Reinharz (1992) 此文雖然名為「女性主義內容分析」(Feminist Content Analysis)，但是文中的討論作者不斷運用文本 (text) 一詞，而且也不限定內容分析就是量化的分析。

要去分析探究，特別是要將這些與當時的社會情況作連結」(p. 163)，特別是社會的權力關係如何介入其中運作，這種聯結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

Said 研究東方主義的權威 (authority) 時，是透過對「策略位置」(strategic location)、「策略形構」(strategic formation) 的分析為其研究的方法論設計 (methodological devices)，前者是去描述作者在書寫東方時，其在文本中的位置為何，而後者則是去分析文本與下列要素的相互關係：文本、文本類型、寫作文類 (genra)、受眾等，這些因素彼此之間如何在更大的文化領域之中獲得重量、密度和權力 (1978: 20)，Said 這個研究便是一個互為正文分析的好範例。另外，Griswold (1994: 14-16) 曾提出文化鑽石 (the cultural diamond) 模式 (見圖二)，指出要更透徹了解一文化客體 (cultural object) 及其與社會世界的交互關係，應該要盡量去分析這文化鑽石中的各要素—社會世界、創造者、文化客體、接收者—之間的互動。這也與社會研究的論述分析的取向相近，將在下文繼續討論。



Source: Griswold, W. (1994)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p. 15.

### 3、論述與社會分析

說明了文本的社會意涵以及文本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適用性之後，本節將討論另一個更重要的研究取徑—論述分析。Fairclough (1995) 雖然大力強調（互為）文本分析，但他的基本看法是文本分析是論述分析的一部分，且主張詳盡的文本分析可以加強論述分析，讓社會研究的立論更有根據且能提供更多的洞見（insights），其他的類似看法是說，避免單純檢視「文本本身」，不能將文本視為是獨立的分析客體，應該要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以及這些具有建構作用論述的社會歷史，都納入分析，所以，文本分析是替論述的社會分析紮下基礎（Turner 原著，唐維敏譯，1998），換句話說，論述分析與社會研究的接合點是更密切的。

分析文本或訊息，當然還是有其根本必要性的，因為訊息並不因為有了多義性，就沒有了它本身的結構。閱聽人並不是想要怎麼看就怎麼看，因為一則訊息（或一個節目）並不只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子，它是一個建構之物。……訊息之內是有其多種表意機制，它們揄揚某些意義、甚至是些優勢的意義，但卻同時壓抑其它的意義：這些就是訊息之中，必然衍生的設限圍地之現象（Morley 原著，馮建三譯，1995: 39）。

一般而言，論述理論家主張：意義不只被賦予，意義是在許多制度性場址、經過許多制度性運作才被社會性地建構。因此論述理論家強調論述的物質性和異質性（Best & Kellner 原著，朱元鴻等譯，1994: 47）。若僅是單獨地分析文本結構，可能會有看不出文本在社會情境中如何被使用的限制，而另外還有一些意義是在文本與讀者的社會情境交集的剎那所產生，所以文本以何種方式在具體的環境中運作，是社

會分析一定不能忽略的，否則若只是受限於文本結構來作分析，則有太形式化之虞（Ang 原著，張娟芬譯，1992: 162）。Morley 也說過，儘管引起注意的是特定的文本，但與此同時，其他論述總是隨時嬉伴在側——論述總是取決於其他的論述形構，它總是透過主體在其他文化的、教育的與制度的等等面向的位置，產生其意義（Morley 原著，馮建三譯，1995: 100）。所以 Heath 會說：意義可說是社會形構、讀者和文本三者循環交互的結果（Belsey, 1980: 69），而也因為論述分析的分析範圍不受限於「文本」本身，論述分析因此也就更有發揮的空間。

但是，論述分析的研究，礙於論述分析本身不是可以一步一步清楚交代步驟的食譜式（recipe-type）研究方法或技術（Burr, 1995: 163），所以一般的經驗研究都未能在行文當中交代分析之過程，以致其主觀、憑直覺之詮釋分析，常引來公訐與責難。在研究之中缺乏方法論的說明，這似乎已成爲論述分析常見之缺陷（Burr, 1995: 167）。但即使如此，似乎也不能因此就將論述或論述分析當作是研究之中語焉不詳的藉口，有時我們的確也可以發現有研究者引用「論述」這個概念，卻避重就輕，未能將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揭示分析，遑論將其權利輪廓與牽涉其中的霸權運作說明清楚：「他（按：指 M. Foucault）所提出的論域形式（discourse, discursive formation）就是企圖區隔的（fragmented）日常生活領域中，如何產生不同形式的權力以在最終形成可以被分析的文本」（王雅各，1998: 42），但文中卻未見其分析再對此「論域形式」概念有所呼應進而呈現出其具體意涵，所以並無法使讀者透過其文而明瞭在其研究之中的論述或論域形式所指爲何。這樣的問題，與前文所指出的「內容分析」研究常有的缺失，似乎也頗類似。

基本上，論述分析是一個跨學科領域的研究取徑，其理論預設及

方法可以對媒體訊息的結構進行更加明顯化、系統化的瞭解作用。正因為論述分析處於各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組合地帶，因此更可以將這種媒體結構與不同認知、社會、文化等脈絡屬性相互連接。根本上來說，Foucault 以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 這個概念來闡明知識/權力在社會的鉅觀與微觀層次之散佈運作，論述是由特定的社會體制所生產出來的語言陳述，而意識形態便是透過這種語言陳述來散播流傳的。

總之，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不以「科學」、「客觀」的假面來自欺欺人，較強調自我反思，似乎也可以是讓社會研究成為批判的實踐（實務）的一條途徑。Said 就曾不只一次的引用 Gramsci 的觀察而明確主張到：「批判性的闡釋 (critical elaboration) 的起點是意識到自己真正是什麼，把『知道自己』當成截至目前的歷史過程的產物，……」（單德興譯，1997: 194；Said, 1979: 25），Said 極力主張 Gramsci 所言的「編纂目錄」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作批判分析之前，先有一番自我探索與省思，而這也就是通常被標列在「後現代政略」大標題下，所謂的「主體立場」<sup>9</sup> 的討論與實踐。此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

……現實從來不是安居不移，若借用一句拉康 (J. Lacan) 的術語，則我們應該說現實總是，而且也只是被掌握、建構而成為現實，換句話說，現實是經由論述而存在的……現實從來不是大體上決定了論述的接觸、決定了現實本身與論述的接觸，但另一方面，這些接觸也結構化了、生產了實體，並且隨而影響

---

9 相關的討論可參見 Best & Kellner (1991)，朱元鴻等譯 (1994)。

了主體在現實中的運動軌跡 (Morley 原著, 馮建三譯, 1995: 95)。

……問題不在於詮釋或改變世界, 而在於是不是認識到我們所生產的知識、我們所製造的詮釋, 必然都會導致社會世界的改變。……人類行動者一方面是在社會結構中形成, 令另一方面也反過來建構了社會結構; …… (Smart 原著, 李衣雲等譯, 1997: 107)

而對 Parker (1992) 而言, 在論述之外則存在有一個現實, 這個現實提供了原始材料, 透過論述, 並進而結構了我們對世界的了解; Reinhartz (1992: 151) 也說: 文件不只反映出規範, 也型塑規範。所以社會研究者欲探索社會現實, 絕對不能忽略了這種辯證關係, 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論述形構與社會現實, 這些原本一直都是社會理論關切的議題, 而經驗研究更應該將這其間的互動的社會過程作細緻的探討分析。Fairclough (1995: 83) 認為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應該對「是誰在使用分析的結果而又是爲了什麼」保持持續的警覺, 並且也應該留意到在批判特定社會實務的同時, 別同時自然化了 (naturalize) 其他相異的意識形態實踐; 而論述理論被非議與批評的一點即是: 傾向於摧毀因果性這個觀念, 並將歷史與社會的限定作用拆解爲隨機性與不可確定性, 舉凡歷史與社會的可理解性、因果的規律性、解釋性的機制……等等的訴求都遭到拒斥 (Best & Kellner 原著, 朱元鴻等譯, 1994: 252)。所以有鑒於此, 便有學者主張: 論述理論可以闡明社會矛盾在政治鬥爭被經驗、被表現的方式; 然而在分析社會中論述以外的層面諸如國家、經濟結構、既有的政治運動等等時, 政治經濟學以及對於宰制力與抵抗力的分析仍是必

要的，因為，這些層面無一能夠詮釋成「論述」的形式而被妥適地理論化（朱元鴻等譯，1994: 254）。所以，儘管論述分析可以幫助解析意義，加強詮釋，但最佳的運用之道，仍是應配合多元交叉檢證的研究策略，以免研究分析有失脈絡（decontextualized）之虞。

在期刊「論述與社會」（*Discourse and Society*）的發刊詞中，Van Dijk（1993）提及該期刊的目標在於欲連繫微觀與鉅觀的社會分析二者之間的鴻溝，這個期刊所刊登的研究主要將在探討論述結構與策略及其與全球和在地社會政治脈絡間的關係，所以文本與社會脈絡都將被廣泛且有系統地加以分析。社會研究在對社會現象作解析時，一向相當關心微觀與鉅觀的連結（the micro-macro link），以便能更深刻地掌握其社會意涵與運作機制。但是一般常被運用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如調查法、實驗法、訪談法、民族誌田野工作等，均很難兼顧此二層面而求得兩全其美，所以在社會研究的研究取向，如果能在研究之中搭配使用論述分析，不僅能增強研究的解析觀點，也不失為一多元檢證的方法！

#### 四、權力、批判與論述實踐

在闡述批判論述分析的原則的一篇文章中，Van Dijk 也提及：基本上批判論述分析是欲探討在支配關係的（再）生產與挑戰過程中，論述所扮演的角色；此處所指的支配關係是菁英（elites）、制度或團體運用社會權力而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包括政治、文化、階級、族群、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就是在這再製（支配關係）的過程中，許多不同的論述—權力關係的「模式」（different 'modes' of discourse-power relations）在其中運作（1993: 249）。舉例來說，「肯定自我，

否定他者 (the others)」的再現策略常是在為既有的社會秩序辯護，將之自然化 (naturalize)，論述分析便可以對此有深入的解析。

揭示當權者如何作正向性自我呈現，而同時又對較無社會權力的他者打壓或加以負面呈現。而 Wartenberg (1998) 也曾有類似的主張，文本不是一統的，其中內含的衝突可以用兩種邏輯來說明：一為吸納的邏輯，另一則為拒斥的邏輯；文本之中常大量出現的「我們」，其實便可視為是欲召喚 (“hailing” or “interpellation”) 讀者，使其「文本社群」 (textual community) 得以形成並且自我肯定，這是吸納的邏輯；而拒斥的邏輯則是針對異己的論述，加以疏遠或否定 (認)，這二者的動態與交互運作，是解析文本之時應該要去注意的，Van Dijk (1993) 以及 Wallace (1994) 都曾針對族群關係的議題作過這類的探討，以實際研究來彰顯論述分析內含的批判性，並且也可以更進一步將其轉化成政治資源，解構既有的支配文本，而為社會研究的實踐性格注入活力。事實上 Said 的名著《東方主義》也正是這種蘊含有此種批判實踐性格的論述分析研究，所以他在為一九九五年版而作的後記之中便論到：

……在本書最後幾頁中我所描述的論述體系鞏固霸權之現實，我的用意乃在作一種開場慰藉，希望能激發阿拉伯世界的讀者與評論家能更毅然決然地去與東方主義的系統奮戰。……我意圖要讓這一本書可以成為先存於當今思潮的一部份，而其目的便是要解放知識份子，讓知識份子從像東方主義的系統性桎梏中解放出來，我希望讀者們可以善加利用我的書，並以豐富多量且有能力的模式生產出一些他們自己的新研究

因此，若是體會到社會研究所建構出來的知識會拋轉出新的方向造成

實踐的真實效果，那麼論述分析更不能為社會研究者所拒斥，還應更加以廣泛運用，甚至可以成為社會研究方法的基本訓練之一。

論述理論將論述詮釋為鬥爭的場域和鬥爭的對象，各個團體在論述中爭奪文化霸權，努力製造意義和意識形態，雖然有些論述分析研究，在分析的過程之中也會採用如內容分析一般的歸類比較，甚至藉由數目字的量化比較來幫助分析，如有關強暴案新聞的研究；但是論述分析更強調形成此現象的結構性因素，也就是說，即使運用了數量的資料，也更要去追問，是怎樣的社會運作機制與過程造成了如此「量」的差異。所以，在相關的論述分析研究之中，作者會明白表示，意圖去探討的是其中的運作機制或權力結構，除了林芳玫（1996: 70）的研究，其他的本土研究，如趙彥寧（1998: 1）：「……試圖探究於這個特殊的流亡情境中象徵秩序之建構與流亡政權及個人主體再現的**形成機制**<sup>10</sup>」與吳嘉苓（1998: 2）：「台灣的高剖腹產率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被解釋，特別是廣受討論的『婦女行為論』的論述是如何形塑，其中的**權力結構為何**<sup>11</sup>，這些是我要探索的重點」。另外，楊芳枝（2000）從性別政治的觀點分析旅行的相關論述，也提到「男旅人」與「女遊客」分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與價值，而再度強化男尊女卑之不平等：「……這樣的論述其實是建立在父權資本主義的邏輯之上。在這樣的論述裡，男人被等同於理性與生產，而女人則被等同於非理性與消費。在這種等同邏輯下，『女人』這個字眼的文化價值又被負面化了」（p. 7），在楊芳枝更詳盡的有關女性雜誌之論述分析研究之中，也不斷強調其分析的重點是欲探討政治經濟權力運作機制如何透過論述而將

---

10 此粗體字為本文作者所標示的。

11 此粗體字為本文作者所標示的。

不平等的關係結構化且維繫住 (Yang, 1999)。因此，可以這麼說：權力機制如何安排運作，幾乎是所有論述分析研究共同欲探討的焦點。因此，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者 (Marxists) 所常用的「意識形態」概念，將其視為是社會的上層結構，論述被認為更能將語言的微觀結構與鉅觀的社會脈絡相連結，所以論述分析便日漸被廣為採用，Andermahr (1997: 54) 甚且說道：論述這個概念是九〇年代的女性主義理論所不可或缺的！

## 五、結語：方法論的啓示與再思

內容分析、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都是針對社會製成品作解析的研究取向，但其功能與在研究實務上的運用各有其優劣，本文僅是嘗試作一評析。大體說來，內容分析是較實證主義傾向，強調科學客觀的量化分析；而文本分析和論述分析都是較強調意義的詮釋解析，只是文本分析通常只針對一種社會製成品，如新聞報導、文學作品、電影或海報圖片，作解析和意義詮釋，但晚近學者都很強調文本分析社會研究之中的「互為正文的分析」或「語境分析」。至於論述分析，則包含更為廣闊，不只是單純僅檢視文本本身，而是將建構文本所使用的論述及其相關社會場址 (institutional sites) 和歷史文化因素都納入分析之中。所以論述分析絕對不是一種任意的拆解，其物質性的基礎與實質效應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不容忽視。

基於前文之討論，本文最後在此結語部分將以方法論的相關議題探討來作結：

就像在作會話或語言的互動分析之時，不僅應該要留意那些被明講出來的話語 (words)，也要去審慎探究言談 (所造成的) 互動 (spo-

ken interaction)，而那些沒被說出 (unsaid) 的，或是不可說的 (unsaidable) 隱藏訊息，更是不可忽略的線索 (Kitamura, 1990; Moerman, 1992: 34)。而在前文的申論中，筆者也曾提及無法回答「爲什麼」是內容分析的一大缺失，而相反地，文本與論述分析正可以補此不足，但是，在作文本分析時也不能只注重語一文層面的意義研究或單獨只分析文本結構，很多的研究者在解析史料或其他的文本資料時，常常只是抽取其中共有的思維結構，或是以分門別類的方法來作整理分析 (如張珣, 1997; 李慶善, 1996)，罕見擴展至非語一文層面的意涵研究，例如針對該文本爲何被生產出來以及其所出現的時空背景作意義的詮釋解析，以致在廣度和深度均嫌不足；事實上應更進一步將相關的社會政治因素加入分析，才能對社會文本有更適切且深入的了解；因爲文本也是置身於一整個社會政治關係的領域中。

此外，既然已經了解到「沒有完全中性且透明的方法可以來再現自然或社會世界」(Atkinson and Hammersley, 1994: 254)，那麼在將蒐集得來的訊息 (information) 轉化成資料 (data) 的過程之中，不免也會有所有再現會招致而來的問題，所以對這種像訪談或觀察資料整理之後的敘事話語加以檢視分析，便是必要的；誠如 Larsen 所言，「在檢視及詮釋訪談訊息、觀察文獻及其他實證「資料」上，文本分析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方法。文本分析的內涵可以幫助提醒其他質化研究者，儘管資料蘊藏無數的資訊，但是它們終究只是文本，必須經過分析與詮釋，才能真正幫助研究者了解其中資訊」(Jensen & Jankowski 原著，唐維敏譯，1996: 189)。也就是說，在研究過程當中蒐集到與紀錄下來的資料，需要經過解讀與分析，才能發展成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知識，而這其中的詮釋、解讀與分析，其實便是在作類似於文本分析的工作，其本質與過程並無二致！

而我們若是進一步地思索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形構與再現之間的關係，則就如 Foucault (1973: 362-363) 所言，人文科學的分析並不是導向「生活、勞動和語言」最透明的狀態，而是導向各式各樣人類存在的再現，所以人文科學除了「唯再現是從」(the primacy of representation) 外，是無路可走的，因為「再現」既是人文科學的目標領域，也是人文科學的「知識形式的一般基礎，也就是使其成為可能的基礎」(Smart 原著，李衣雲等譯，1997: 62)，據此而論，再現對人文科學研究既是如此重要，那麼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就更是必要的探究取徑了！人類學家 Geertz (1971) 曾主張透過文本的以及詮釋的取徑，以豐厚的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來研究探討文化的象徵元素間的內在關係。所以將研究分析的對象視為文本，仔細地詮釋分析其內在意涵與外在交互關連的社會情境脈絡與論述形構，是台灣的社會研究可以發展的一個方向。

因此，不管是採用內容分析或文本及論述分析也好，只要是針對文件資料或任何其他社會製成品所作的分析，都應該配合呈現實例，並具體而詳盡地描述出分析的素材以為佐證，增加其研究的說服力。

至於有關信度與效度的問題，曾有研究者認為欲妥當處理信度的問題，可藉由將田野中的決策作成記錄文件的步驟與方法 (Kirk & Miller, 1986: 73)，所以在作文本與論述分析的過程，當然也可已將資料的蒐集、歸類整理，意義捕捉，呈現策略等步驟加以登錄，以供作為信度評估的基礎，但整體而言，質性研究方法論的相關討論傾向於主張詮釋的基礎應是在於可信的經驗資料之間的交叉檢證 (triangulated empirical materials that are trustworthy) (Denzin, 1994: 508)，Guba 和 Lincoln (1994) 便提出了以「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 來取代「效度」；而 Hammersley (1990) 則認為效度就是反省，

所以當論及或運用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之時，應當明瞭到質性研究者所建構出來的「另類」標準及不同於實證主義傳統的方法學詞彙，所以不能用評估內容分析或其他量化研究的那一套標準來一以蓋之。反倒是應強調「社會研究應是具反省性的」此特質，如 Chaplin (1995) 所言，社會研究是關於社會論述的社會論述，所以文本被建構出來的社會過程本身就非常值得去揭露檢視 (p. 281)，社會分析本身便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而 Burr 也主張那些嫻熟的「論述使用者」(discourse-user) 可以隨心所欲的運用各種手段，將其所欲的認同建構出來，為他們自己建構同時也可抗拒由他者所提出的建構 (1995: 92)，所以 Foucault 會主張權力與論述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權力內在於論述，論述也便是權力。權力像是循環於論述內部的血液，而論述猶如權力的脈膊 (黃道琳, 1986: 28)。這樣的看法，和實證主義認為文本是透明的、只是傳播的中介管道或媒介，持完全相反的立場。

此外，Van Dijk (1993) 也指出：批判論述分析是否成功除了可由其有效性和關連性來看之外，同時也可以視其是否造成變遷來衡量 (p. 253)。舉例來說，一個研究者可以針對既有的原住民教育論述進行分析，試圖去探究原住民的教育「問題」如何被界定、解釋，這些論述隨後又如何被運用且據之以制定相關政策，學業成就低落，課業表現不佳常是相關研究論述所關切的「問題」，而後企圖歸因至原住民的文化或家庭等。這樣的論述其實常會忽略更深層蘊藏在教育實踐中的「漢族中心主義」，可能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所以若能進一步對相關論述作解析，則不僅可以揭示其中的權力形構與運作邏輯，鬆動其既有的理解框架，甚且尋求其他更多的可能性，如問題的論斷、歸因、解釋和研究的應用之道，如此便可間接促成社會變遷。Said 的《東方

主義》研究，便因而鼓舞激發了非洲主義研究、後殖民人類學、女性主義和許多其他的弱勢團體研究，讓這類的論述有長足的進展，這其實也可說是一種促成社會變遷的重要影響力量。

如果我們了解到論述是一套意義體系，它會構成我們的所思所言，形塑我們行動的感受與慾求，而且常常在同時，我們似乎又同時會覺得有某種程度的選擇存在於論述之中供我們使用（Burr, 1995: 85），那麼，我們就更應該仔細捕捉其運作形貌，因為社會權力關係的運作常常都不是顯而易見或由上而下那麼直接了當的，論述形構便是最好的例證，所以社會研究的進行當然也就應具有更敏銳的批判和自省精神，以求對社會文化現象有更深入且具生命力的解析。

在方法論層面的另外一個問題：或許應該更進一步思索研究方法彼此之間的相容互補性，且更深切體認到古典社會學家 M. Weber 所指出的探究社會實體的無限性，那麼，不管是內容分析、文本或論述分析，都是欲對所研究的對象作合理的推測與研析；強調詮釋與批判的同時，其實也不能忽略了解與解釋的基礎功夫。

讀者或許從字裡行間以能感受到筆者寫作本文，的確採取了一種褒此（論述分析）貶彼（內容分析）的立場，但是筆者也絕對肯定內容分析研究取徑能對大量資料作系統化分析的貢獻，但是在繁複的資料蒐集和分析過程之中，不應該是對任何事務都強加分類量化，更不應該仰賴電腦先找出「漂亮結果」；再者，研究者也先應自我詰問：作為一個知識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自我以及所生產出的論述在社會歷史的定位為何？研究者不應是一個疏遠且對現實漠不關心的人，而是個有觀點、有立場的多元文化主體（multicultural subject），據 Denzin and Lincoln（1994: 11）將質性研究分成五個歷史時期，其中最晚進的趨勢之一即是強調行動研究<sup>12</sup>（action-, activist-

oriented research) , 強調研究的批判實踐意涵, 這也正好與論述分析的目標相合, 所以論述分析是不容忽視的社會研究取徑, 在現今多元方法交叉檢證 (triangulation) 的研究策略已成重要要求的時候, 應可將之納入基礎訓練之中, 以便對蒐集得來的資料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與分析, 以臻研究之精進。

## 參考文獻

于治中

- 1991 正文、性別、意識形態——克麗絲特娃的解析符號學, 呂正惠主編, 文學的後設思考, 頁 206-225。臺北: 正中。

王石番

- 1992[1989] 傳播內容分析法, 臺北: 幼獅。

王雅各

- 1998 身體: 女性主義視覺藝術在再現上的終極矛盾, 婦女與兩性學刊 9: 1-54。

白亦方、吳嘉惠

- 1997 美國國小社會科課本中的政治社會化相關內容分析, 論文發表於「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創校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花蓮: 花蓮師範學院主辦, 86 年 4 月。

朱元鴻等譯, Steven Best & Douglas Kellner 原著

- 1994 後現代理論: 批判的質疑, 臺北: 巨流。

李衣雲、林文凱、郭玉群譯, Barry Smart 原著

- 1997 後現代性, 臺北: 巨流。

李慶善

- 1996 知解人心: 從諺語看中國人社會認知的特點, 楊國樞主編, 中國人的人際心態, 臺北: 桂冠。

---

12 這類研究雖有其爭議性, 但就晚近的質性研究論述而言, 的確有不少學者是力主此一研究取向的。

林芳玫

1996 女性與媒體再現，臺北：巨流。

林文淇譯，Graeme Turner 原著

1997 電影的社會實踐，臺北：遠流。

吳嘉苓

1998 產科醫學遇上「迷信」婦女？——台灣高剖腹產率論述的知識、性別與權力，  
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台北：台灣大學。

胡湘玲譯，Tony Bennett 原著

1992 歷史中的文本，陳光興、楊明敏編，內爆麥當奴，頁 167-180。臺北：島嶼  
邊緣雜誌社。

唐維敏譯，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原著

1996 大眾傳播研究方法，臺北：五南。

唐維敏譯，Graeme Turner 原著。

1998 英國文化研究導論，臺北：亞太。

秦葆琦

1999 國民小學社會科第五冊「人際關係」單元之各版本教師用書分析研究，國教  
學報 11: 347-384。

張 珣

1997 幾種道經中對女人身體描述之初探，思與言 35 (2): 235-265。

張錦華等譯，John Fiske 原著

1995 傳播符號學理論，臺北：遠流。

張娟芬譯，Ien Ang 原著

1992 通俗虛構故事與女性主義文化策略，陳光興、楊明敏編，內爆麥當奴，頁 161-  
166。臺北：島嶼邊緣雜誌社。

黃道琳

1986 知識與權力的毀解：米修·傅柯及其思想，當代 1: 22-33。

游美惠

1991 文化、性別與性：從色情海報看文化的建構與解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馮建三譯，David Morley 原著

1995 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臺北：遠流。

單德興譯，E. Said 原著

1997 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

楊芳枝

- 2000 離「家」出「遊」：論旅行的性別政治，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54: 5-7。
- 趙彥寧
- 1998 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論文發表於第三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台北：台灣大學。
- 瞿海源
- 1982 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相容性與互補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Andermahr, S., T. Lovell and C. Wolkowitz
- 1997 *A Concise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rnold.
- Atkinson, P. and M. Hammersley
- 1994 "Ethnograph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Pp. 248-261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bbie, E.
- 1995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Seventh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Barelson, B.
-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 Barr, C.
- 1975 "Comparing Styles: England vs. West Germany" in E. Buscombe (ed.) *Football on Television*.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Belsey
- 1980 *Critical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Berger, A. A.
- 1995 *Cultural Critic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urr, V.
-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aplin, E.
- 1995 *Sociology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enzin, N. K.
-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Pp. 500-515 in N. K. Denzin &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urant, R. H. and E. S. Rome  
1997 Tobacco and Alcohol Use Behaviors Portrayed in Music Videos: A Content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7(7): 1131-1136.
- Durrheim, K. and S. Mokeki  
1997 "Race and Relevan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7(4): 206-214.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Ford, John B., P. Kramer Voli; et al.  
1998 Gender Role Portrayals in Japanese Advertising: A Magazine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7(1): 113-125.
-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eertz, C. (ed.)  
1971 *Myth, Symbol and Culture*. New York.
- Griswold, W.  
1994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mmersley, M.  
1990 *Read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Critical Guide*. London: Longman.
- Iser, W.  
1980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Pp. 50-69 In J. P. Tompkins (ed)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 Kirk, J. and M. L. Miller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 Kitamura, K.  
1990 Interactional Synchrony: A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Communication. Pp. 123-140 In M. Moerman and M. Nomura (eds) *Culture Embodied*.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Mann, S. and M. D. Grimes  
1997 Paradigm Shifts in Family Sociology? Evidence from Three Decades of Family Textbook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8(3): 315-350.
- Manning, P. K. & B. Cullum-Swan  
1994 Narrative, Content, and Semiotic Analysis. Pp. 464-477 In N.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 Moerman, M.  
1992 "Life After C. A.: An Ethnographer's Autobiography." Pp. 20-33 in *Text In Context*. Newbury Park: Sage.
- Parker, I.  
1992 *Discourse Dynamics: Critical Analysis for Socia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 Reinharz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  
1979(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Taylor, C. R. and B. B. Stern  
1997 Asian-American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2): 47-62.
- Thompson, I.  
1999 Women and Feminism i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13(2): 154-179.
-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Valdivia, A. N. (ed.)  
1995 *Femin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Global Divers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n Dijk, T.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2):

249-283.

Wallace, M.

- 1994 "Multiculturalism and Oppositionality." In Giroux, H. & McLaren, P. (eds) *Between Borders: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Wartenberg, T. E.

- 1998 "Teaching Women Philosophy (as a Feminist Man)" Pp. 131-146 In Digby, T. (ed) *Men Doing Femi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Yang, Fang-Chih I.

- 1999 *(Inter) nationalizing Taiwanese Women's Magazines: Birth of Consuming Women*. Ph.D. Dissertation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